

世界文化論壇報

CULTURE COMMUNICATION

北美第一家華人文化報 在美華人的精神家園

2025 年 6 月 30 日

第 107 期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1540-2339

主辦：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 (IPDC)

協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 (CPS)

生態文明的全球探索與實踐

——第 18 屆克萊蒙生態文明國際論壇綜述

王 尚

2025 年 6 月 5 日，正值世界環境日，主題為“為時不晚——走向生態文明”的“第 18 屆克萊蒙生態文明國際論壇暨第 7 屆國際青年生態文明論壇”在美國著名生態城克萊蒙的波莫納學院 (Pomona College) 成功舉行。本次論壇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美國過程研究中心主辦，美國生態文明研究院、波莫納學院、克萊爾蒙特市政府等機構協辦，並由中國生態文明研究與促進會提供指導與支持，旨在推動全球生態文明理念的發展與實踐。會議匯聚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非營利組織負責人與社會實踐家，圍繞生態文明建設中的核心議題展開深入探討，反映出當前人類社會在面對生態危機與文明轉型中的共同關切、理論重構與行為實踐的迫切需求。

當前，全球範圍內生態失衡與氣候危機持續加劇，傳統工業文明的發展邏輯日益暴露出其不可持續性，如何走出一條尊重自然、保障公平、面向未來的發展道路，成為當代社會亟需回應的重大課題。

一、主旨報告綜述：生態文明的思想建構與實踐路徑

在本次論壇中，多位享有國際聲譽的學者與實踐

者圍繞生態文明主題作了富有洞見的主旨報告，深入探討了生態轉型的理論基礎、制度挑戰與文化願景。

首先，英國生態文明理論家與作家杰裏米·倫特 (Jeremy Lent) 在其題為《生態文明的理論與實踐構想》的報告中，系統闡釋了生態文明的理念根基與未來藍圖。他指出，人類文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滑向氣候崩潰、生態瓦解與極端不平等的深淵，唯有從文明根基層面進行徹底轉型，方能避免這一命運。

生態教育家、生態設計專家大衛·奧爾 (David Orr) 則在《教育與偉大轉型》一講中，對當前教育體系的局限進行了深

刻反思。他指出，儘管人類正面臨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及環境不正義等系統性危機，但當代教育却往往停留於既有範式的修補，缺乏真正的

本期要目

- | | |
|-------------------------------|----|
| ◆生態文明的全球探索與實踐 | 01 |
| ◆生態文明需要新的商業思維 | 05 |
| ◆生態教育先驅大衛·奧爾榮膺第 17 屆“柯布共同福祉獎” | 08 |
| ◆共同福祉與生命的鮮活感 | 10 |
| ◆祛魅與重構：建設性後現代視閥下的《我的阿勒泰》 | 12 |
| ◆用責任感雕刻出企業的靈魂 | 13 |
| ◆身心板結與語言治療 | 15 |

變革力量。他主張教育改革應從認知方式、知識結構和生活實踐三方面進行系統重構，強調教育的根本使命不僅在於“教人如何思考”，更在於“教人如何生活於相互依存的世界”。

著名生態經濟學家、社會政策專家克利福德·柯布（Clifford Cobb）則在其題為《超人工智能（ASI）是否正在制造“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講演中，從技術批判、文化反思與哲學質詢的交匯點出發，深入剖析了 AI 發展對人類社會的潛在威脅。柯布指出，人工智能正經歷從 AI 到 AGI、再到 ASI 的指數級躍遷，其背後的效率邏輯可能加劇經濟不公、削弱人類思維與協作能力，甚至威脅人類的生存條件。柯布批評當前大學教育結構助長技術理性霸權，缺乏倫理與哲學層面的反思能力，呼吁在文化、政治與制度層面進行結構性重構，避免陷入由“超級智能”主導的技術托管文明。

在以“生態文明需要新的商業視角”為題的報告中，美國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領袖大衛·施沃倫（David Schwerin）從倫理與實踐雙重維度反思了企業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可能角色。

中國企業家代表、東莞泰威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文良則以“天地人和”的傳統文化理念為核心，在企業治理中展開了一場具有制度創新意義的生態實踐。

在高等教育議題方面，可持續研究與教育學者馬庫斯·福特（Marcus Ford）在其題為《高等教育改革是否為時已晚？》的報告中指出，當前大學教育在面對全球生態危機時顯得力不從心，通識教育逐漸失去回應學生未來焦慮與現實危機的能力。他主張構建一種以“文

明所面臨的生存威脅”為背景、面向 21 世紀系統風險的全新課程體系，強調重構人與自然關係必須成為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標。

在論壇的最後一場主旨演講中，資深敘事藝術家蘇珊·施特勞斯（Susan Strauss）以《生態文明的偉大敘事與我們的共同未來》為題，通過對神話、寓言與自然文本的講述，喚起聽眾對“象徵世界”（Imaginal Realm）的重新認知。

二、生態文明發展與建設的多維探索：分會場學術交流

1. 社會價值觀轉向下的生態文明意識重構

在“是否為時已晚”專題分論壇中，學者們揭示了生態危機背後工業文明價值觀的根本性缺陷，指出人類中心主義與機械思維正推動全球生態系統走向崩潰，而生態文明的構建本質上是社會價值觀從“徵服自然”到“韌性共生”的系統性革新。部分學者認為，全球升溫 3℃ 的趨勢已使單純預防氣候危機的思路失效，當務之急是通過價值觀重塑構建具備生態適應性的韌性社區——這要求打破“消費至上”的經濟邏輯，將生態承载力作為生存倫理的核心。另有學者強調，當前環境危機本質是價值觀危機，主流發展模式已導致全球數百萬群體受衝擊，唯有通過協作規劃與個人生態實踐，才能實現價值認知與行為選擇的統一，而這種轉變需超越樂觀與悲觀的二元對立，將生態責任納入個人道德完整性的範疇。

值得注意的是，後現代飲食哲學與中國環境正義理論從價值觀層面提供了突破性思考：工業飲食的機械思維將生物視為“蛋白質單元”、將食物簡化為“卡

路裏計算”，割裂了飲食的生態與文化意義，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王治河博士由此提出“建設性後現代飲食哲學”，主張回歸中國“厚生”哲學，即在融合傳統全谷物飲食與西方可持續理念的同時，使飲食成為連接“生命倫理－文化認同－生態責任”的價值載體。

同時，世界上多個宗教與傳統思想中的精神與內涵都能為生態文明價值觀提供更深刻的驅動力。在基督教神學領



域，有學者指出傳統“統治自然”的創世觀加劇了生態危機。另一些學者從新約出發，將可持續發展與“創造的完整性”結合，認為基督教的愛與利他主義倫理可推動人類與非人類生命建立智慧、正念的關係。

在中國的傳統思想領域，有學者關注到《道德經》中的“地母”思想不僅與蓋婭假說形成跨文化共鳴，其更是通過“靜”（穩定性原則，對應生態穩態演化）、“厚載”（去主觀中心化，強調生命平等）、“不爭”（共生性原則，形成非對抗協同網絡）三大原則，構建起與“道”同構的生命性存在體系。

而在原住民與後殖民語境下，有學者以巴西生態災難為例，將其被視為“宇宙觀政治的戰爭”的一部分，即基督教極右翼借神學話語合法化環境破壞與殖民剝削，而亞諾瑪米部落中的薩滿式宇宙觀則揭示，生態危機本質是殖民入侵與“商品崇拜”對神聖自然秩序的破壞。此外，還有研究強調信仰社群在生態社會主義實踐中的作用，通過教會與政黨合作，試圖在宗教倫理與階級鬥爭中構建資本主義替代方案。

2. 社會活動各領域中的生態文明路徑探索

面對傳統發展範式的局限，學界與社會實踐者從科技、哲學、經濟、藝術、國際合作與教育等多個維度，探索生態文明的多元路徑。

從科技的歷史性維度來看，有研究為科技與生態文明之間的關係提供了獨特的歷史視角。該研究通過展示明清以來河東鹽池的演變揭示了技術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動態關係，展現了人類技術活動對地理環境的長期影響，這既為理解人地關係演變提供了典型範例，也印證了技術應用需兼顧生態可持續性的歷史教訓。

從科技與哲學的交叉維度來看，過程哲學為科學技術的生態化探索提供了理論框架。一方面，有學者利用聲音藝術裝置模擬懷特海過程哲學中的“事實－重要性－表達”模式，探索技術美學與生態認知的融合；另一方面，有學者通過將懷特海有機哲學與鮑爾（Ervin Bauer）的一般生物學相結合，為生命本質提供了科學與哲學雙重解釋。

同時，人工智能在生態危機中的角色同樣引發了辯



證思考。有學者指出，ChatGPT 等大語言模型雖被視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潛在工具，但其高能耗硬件與算法“幻覺”問題（如給出看似權威却錯誤的解決方案）可能加劇生態負擔。另有研究通過“訪談” ChatGPT 發現，當前 AI 對生態危機的回應存在邏輯斷層，而相應的解決方案必須經過人類價值判斷與技術倫理的雙重審視。

在商業經濟領域，有學者提出以社區互助模式破解債務困境，即依托西方社區中特有的教會組織，及其主導的“債務消滅團隊”來踐行“共同承擔負擔”的理念；另有學者批判現行經濟體系對“價值－所有權”的過度依賴，主張構建“過程導向經濟”，以意義取代價值、以“共有”替代“私有”。

在企業倫理層面，有研究援引懷特海大蕭條時期對哈佛商學院的演講，強調商業需從短期逐利轉向長期社會福祉，將商業化活動視為文明化力量，培育“遠見”與合作的美德。

而在國際關係領域，多位學者聚焦中美氣候合作，指出兩國作為最大經濟體與排放國，雖存在戰略分歧，但在美國的綠色技術創新與中國的規模實施上具有互補性，合作可加速清潔能源轉型；同時有學者指出，中美之間的學術交流正面臨技術封鎖與簽證限制，因此需通過多邊機制創新維持學術對話，為全球生態文明注入動力。

除此之外，生態文明教育作為改變與培養生態意識與價值觀的最直接方式，同樣被多位學者關注和重視。樊美筠博士基於懷特海過程哲學提出“生態人”培養目標，主張打破笛卡爾二元論，通過“學習者作為關係性存在”“教室作為生態系統”“課程聚焦生態智慧”的三

重轉變，將教育重心從知識傳遞轉向培養對自然依存關係的覺知。另有學者以印度桑提尼克坦（Shantiniketan）小鎮為例，分析地方社區、實踐共同體與信仰團體三類學習社區的運作機制，強調其以“問題導向－智慧探索”替代傳統權威灌輸的教育模式。

在課程與教學創新層面，跨學科讀本“生命的意義與一健康”整合生命倫理、生物學與社會學，通過“關懷生命心智模型”與過程詩學教育法，實現科學與人文的生態融合。而針對不同年齡段教育實踐，有學者借鑒英國正念教育模式，開發了 PROcess 項目，將過程哲學的“事件－關係－價值”思維轉化為青少年可理解的內容；還有學者基於胡伊青加“遊戲人”假說，批判教育工具化傾向，主張以懷特海“浪漫－精確－概括”學習周期為框架，將高等教育重構為激發內在價值的“動態遊戲”。

藝術與美學的探索則進一步拓展了生態文明的感知維度與表達方式，賦予其更加豐富的文化生命力。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李玲博士提出基於過程哲學的建築新範式，未來建築發展突破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局限，以“建築過程論”重構本體價值，強調文化、社會、生態多元統一，推動建築可持續發展。另有學者探討生態藝術多維價值，提出“生態詩學”理論框架，突出關係生成、具身體驗及語言形式的創造性潛能。還有學者批判“美無用論”，指出忽視美與實用性的關聯導致生態破壞，主張將美作為重要生態原則。

3. “以生命為中心”：生態文明實踐的成果

來自新華社研究院的研究團隊在本次論壇的專場報告中，詳細介紹了《讓世界讀懂美麗中國的“綠色密碼”》報告的核心內容，並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兩山論）提出 20 周年為契機，系統闡釋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理論構架與實踐成果。報告所傳遞的“綠色中國、和諧共生”願景獲得了與會各國學者的高度評價，強化了中國在全球生態文明對話中的制度話語權與實踐領導力。

作為具體的地方實踐案例，洛陽柯布生態文明院士工作站的研究成果為生態文明的教育路徑提供了生動樣本。報告以嵩山世界地質公園與洛陽龍門海洋館為對象，提出了“館—校—社”三位一體的生態教育機

制，強調博物教育在培育生態意識、構建地方認同和推動全民參與中的橋梁作用。

論壇中的另一些發言則從哲學、倫理與經濟結構層面對“以生命為中心”的生態文明理想展開深化探討。有學者批判性地指出，現代經濟體制下的“掠奪式發展”導致了生態系統的深度危機，因此必須以“生命共同體倫理”為基礎，推動“人性化發展”的替代性路徑。

來自其他各個國家的報告則多從文化精神與意識結構的層面出發，呼吁通過“心靈形上學”或“生態心智轉向”來重構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相關發言者主張，從過程哲學的視角來看，宇宙是一個創造性推進的關係整體，而生態文明的建設必須基於人類意識的轉型，即從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轉向以生態為中心的意識。

在信仰與倫理的交匯處，一些報告則提出了“神聖自然”的再發現與“倫理共同體”的建構。通過對神學傳統與現代生態倫理的對話，主張以一種重新審視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與角色的方式來激活我們對大地、生靈與未來的責任感。

三、總結：開創生態文明發展新篇章

第 18 屆克萊蒙生態文明國際論壇暨第 7 屆青年生態文明論壇以跨學科、跨文明的深度對話，展現了全球生態文明研究的前沿動態與實踐創新，勾勒出一幅多元共生的生態文明圖景。與會者一致認為，我們的文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衝向氣候崩潰、生態破壞和貧富懸殊的懸崖邊緣。要拯救“瀕臨崩潰的地球”和人類自身，扭轉人類的發展軌跡，就需要從根基上進行變革：從以財富積累和資源掠奪為基礎的文明，轉向崇尚生命價值的生態文明。

生態文明的願景不祇是一個目標，更是一條通往未來的路徑。它要求我們在動蕩中堅守希望，在轉型中培育信念，在複雜性中重建整體感。未來，這種持續展開的全球對話與集體反思，必將推動生態文明不斷走向深入，並為人類社會在 21 世紀的自我超越提供堅定而深遠的文化支點。

（作者王尚，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

生態文明需要新的商業思維

【美】大衛·施沃倫 蕭逸林 譯

【編者按】大衛 施沃倫（David A. Schwerin）博士是美國著名企業家，美國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領袖，著名心路治療專家。代表作有：《自覺資本主義》《自覺的全球主義》。合著有：《企業中的新範式》《新的底線：將心與靈魂帶回企業》、《超越通常的企業》《選擇未來》《企業與女性原則》《企業的新傳統：21 世紀的精神與領導》和《將快樂帶進你的生命》等。

施沃倫博士對中國非常友好，先後九次來中國進行訪問，曾應邀在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等單位發表演講，並多次接受《中國青年報》《文匯報》《中國綠色時報》等媒體採訪，其發表在《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學報》2013 年第 3 期上的訪談《綠色是金：商業與環境關係的新詮釋》，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本文系施沃倫博士在剛剛結束的第 18 屆克萊蒙生態文明國際論壇上的大會發言。經施博士同意，刊發在此，以饗讀者。在此特向施博士表示謝意。

多數人（包括生態文明的倡導者）很少思考商業在推動生態文明這一重要事業中的作用。人們普遍認為企業貪婪短視，不值得納入考量。雖然這種看法似為常識，却失之偏頗。首先，幾乎所有人都直接或間接參與商業活動——醫生、律師、教育工作者、農場主等，都在提供待售的產品或服務。生產與銷售正是商業的核心所在！

企業貪婪慷慨與否取決於領導者。具有自我認知的領導者會自然踐行公平與可持續原則，他們洞悉萬物互聯，明白利他即利己。因此，關鍵在於推動更多人獲得自我認知，從而理解以何為重以及如何為生命做出最佳貢獻。

商業環境恰是獲取自我認知的理想場所。職場中的上下級與同僚關係促使人們直面恐懼、疑慮與抱負，在與競爭者及合作者的互動中認清動機。他們會發現協作比衝突更具成效，優缺點也愈發清晰。自我認知自然催生對美好世界的追求，進而成為生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生態文明是建立在人類與自然界（包括動植物和礦物）完全共生基礎上的深遠構想。人類活動應以不傷害地球為前提，致力於維系健康與福祉。成功的標準將是人類與星球的整體福祉，利潤僅是次要考量。正如杰裏米·倫特在《Yes!》雜誌 2021 年春季刊《生態文明是何模樣？》中所言：個體健康取決於社會健康，而社會健康又依賴於健全的生態系統。這意味著競爭與合作需要平衡，從而實現財富與權力的公平分配。

倫特強調，平衡原則對生態文明至關重要。這一觀點與深奧的心路教學體系不謀而合，這一心智－靈性體系指出：“平衡維系宇宙存續，失衡將導致萬物崩解”（皮爾拉科斯，第 228 講）。

尋求平衡

我們身處混亂而充滿挑戰的時代，根源在於多重失衡：

- 人類本質是經歷物質體驗的靈性存在。正確認知下，物質生活為次，靈性生活為本——這與大眾的認知優先級恰恰相反。
- 不平等現象肆虐，這種不可持續狀態易引發動蕩與反抗。
- 男性特質壓制女性特質，唯有兩者平衡，才能修復地球健康並促進統一。

- 自然遭受剝削而非滋養。“人類需掌控自然”的謬見導致經濟決策扭曲。生態環境才是根本財富來源，失去生態支持系統，經濟必將凋零。

- “萬物割裂自治”的信念必須摒棄，這種觀念滋生恐懼等負面情緒。萬物本然相連，遺忘此理，和平與滿足終難維系。

- 生活體驗（無論是運動、學術、商業或其他）皆助人成長，提供自我認知的契機。數千年來，提升自我認知始終是公認目標。忽視此原則將打破生命平衡。

自我認知（知曉我們是誰、為何存在）至關重要。唯有充分認識自我，才能確信我們安全、被愛且永恒。明白這些真理，便無可畏懼，無需爭競。我們實為具有無數面孔與個性的同一存在。

商業環境是提升自我認知的理想場所。職場中，人們持續與同僚、下屬及上級互動，以支持或對抗姿態面對競爭者，最終領悟協作才是創新、效率與繁榮的最佳途徑。著名細胞生物學家布魯斯·利普頓（2012 年，第 249 頁）指出：“細胞系統的成功不在於器官組織間的競爭，而取決於其協作效能。不同器官中獨特細胞的工作差異恰是其價值所在。國家若彼此為敵，就如同人體系統企圖放逐某個器官般荒謬。”

創建公民相互尊重的國度，能提升人們自願協作造福整體的可能性。個體知識雖有限，集體智慧却不可小覷。通過職場互動，我們認知自身的活力源泉、恐懼所在與行為動機，了解局限與優勢，經歷成敗起伏，從而明確平衡生活所需的核心價值與優先級。更深的自我認知將引導人類自然追求公平與可持續——這正是生態文明的明確宗旨。

領導力大師沃倫·本尼斯教授（2009 年，54–55 頁）曾為四位美國總統提供諮詢，其 30 餘部領導力著作中的論斷發人深省：“缺乏自我認知是領導失敗最常見根源。”其他智者也提出相似見解：

- 托爾斯泰（1900 年）：人人都想改變人類，却無人想改變自己。
- 老子（公元前四世紀）：勝人者力，自勝者強。

- 心路教導：唯有越來越多人追尋自我認知之路，理解內心最深層的動機與感受，世界和平與和諧方能實現（皮爾拉科斯，第 67 講）。

具體而言，自我認知指對我們心理狀態的了解：所思、所感、所信、所求。它關注內在而非外部世界。“內省”（即觀照內心）正是理解這些心理狀態的途徑。遺憾的是，多數人更關注外在成就（如物質成功與職業晉升）而非內在成長。唯有內觀，才能獲得減少弱點、強化優勢的智慧。自我認知還能提升生活各領域的決策效能，幫助我們減少挫折感、不安、嫉妒與壓力。此外，高度自我認知者更具同理心與慈悲心，這種認知能力可增強我們過和諧美滿生活的能力，其洞見能引導我們選擇最有益健康與福祉的行動。

獲取自我認知

人們可從誠實審視自身優缺點起步，逐步改變無益特質（如自私、不誠實、傲慢等）。這些特質阻礙個人成長。例如，對己對人的評判皆無益處——我們無從知曉他人如何被環境塑造，經歷過何種創傷，正在克服何種業力。覺察自身的評判傾向並努力認知這一點，是自我認知之路的重要一步。

另一需檢視的特質是我們對人或事的控制欲。實際上我們幾乎無法掌控任何事物——鑒於無法窺見宇宙全貌，這未嘗不是好事。破除錯誤信念也至關重要，常見謬見包括：槍支保障安全、金錢創造快樂、藥物促進健康、信息等同於智慧、死亡是生命終點等（關於“死亡”的深入探討可參閱 www.consciousthinking.com）。最後，請檢視身體、情緒、心智與靈性生活是否平衡，優先調整失衡最嚴重的領域。可信賴的伙伴或治療師可協助確定最需改變之處。

新的企業模式

我在《財富準則——自覺資本主義時代的企業模式》一書中提出了“自覺資本主義”（Conscious Capitalism，簡稱 CC），為環境可持續且個人獲益的商業環境提供了優秀範本，從而為開明的生態文明構建了框架，導向公平、包容且可持續的社會。



《财富准则——自觉资本主义时代的企業模式》中文版于2001年10月由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後，在中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各大媒體對該書發表了評論和報道，該書封面甚至出現在北京長安街的公共汽車上。

以社會責任企業為例，在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中（Socially Responsible Business），重點從短期盈利轉向三重底綫——最有利于人、地球與利潤的長期利益。這要求員工、客戶、供應商等“人”的要素，以及地球社區與生態系統至少獲得與利潤同等的重視。令許多人驚訝的是，這種包容性方法極具操作性且利潤可觀。

誠實、公平、透明的企業將獲得以下顯著效益：

首先，公平透明是建立信任的基礎。信任對構建持久穩固的商業關係至關重要，能促進承諾與合作。當人們明確預期並感受公平時，積極性自然提升。

其次，企業（及其產品服務）的聲譽取決於始終如一的誠信。誠信聲譽帶來員工、供應商與客戶的忠誠，吸引才華橫溢的員工，同時提升積極性、生產力與合作精神。擁有忠誠且積極的員工是最大的競爭優勢。

第三，道德企業的員工自尊水平更高，在高標準企業中能獲得滿足感與尊重。生產力與創新力提升，法律、培訓等成本下降。反之，在不公冷漠的環境中，員工易生怨恨，效率低下，缺乏忠誠度，祇求即時回報而非長遠成果。

第四，公平商業實踐能減少法律法規需求。當企業有效自律時，政府可降低監管強度。監管始終成本高昂、耗時且適得其反——惡人總能規避法律，而善者無需外力自會行正。

總之，道德企業能維系長期關係、塑造良好聲譽、贏得客戶忠誠、培養員工自豪感並增加財務成功機會。此外，提供工作家庭平衡的企業可降低缺勤率，延長員工任職年限，從而通過經驗豐富的高效團隊減少招聘培訓成本，並通過改善工作環境降低次品率。

律師、醫生、廚師、教師、運動員等都以不同形式參與商業活動，向各類消費者與企業提供產品或服務。

將社會福祉置於利潤之上的自覺企業，既能建立持久關係、塑造聲譽、贏得忠誠、培養員工自豪並獲取財務成功，又能創建一個健康的地球。

最後需強調兩點：首先必須承認人類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金律在各文化宗教中皆有體現。如布魯斯·利普頓（123頁）所言：“如同我們的單細胞祖先，現在我們必須超越單細胞個性，進化為協調的多細胞整體，使自身利益與地球利益合而為一。”領悟這一真理將終結支配、貪婪、恐懼與仇恨的舊篇章，開創全民學習成長的繁榮文明。

其次，雖然企業常是問題的一部分，但它們同樣能成為解決方案（利普頓194頁）。日常商業互動提供自我認知的契機。具備充分自我認知者將自然而然地建設健康、充實的生態文明。我們必須說服商界人士拒絕混亂與失調，承認現有模式已失效，從檢視並改變那些無益健康與可持續性的信念開始。

創建公民相互尊重的世界，能培育自願協作造福整個星球的環境。當爭議方明確各自利益後，更能將衝突重構為共同問題，視對方為解決方案的必要部分。承認並傾聽對方關切將帶來重大突破。

獲取更深自我認知並實踐智慧，使商業與社會和諧共進，將是我們終極的救贖之道。這也正是生態文明的最佳實踐。

（譯者蕭逸林，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獨立學者）

生態教育先驅大衛·奧爾 榮膺第 17 屆“柯布共同福祉獎”

丁沙沙

2025 年 6 月 5 日，正值世界環境日，備受全球生態人矚目的 2025 年“柯布共同福祉獎”頒獎典禮在美國著名生態城克萊蒙隆重舉行。本次頒獎典禮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漢森（Bruce Hanson）博士和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安德魯（Andrew Schwartz）博士共同主持。

主旨演講嘉賓為美國旗杆大學校長珊卓·盧巴斯（Sandra Lubarsk）教授。英國著名生態文明專家杰裏米·倫特（Jeremy Lent），美國著名生態教育學家奧爾（David Orr）博士，美國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領袖大衛·施沃倫（David Schwerin），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院長陶哲森（Karen Torjesen），美國柯布研究院院長穆爾（Mary Elizabeth Moore）女士，美國生態文明研究院院長克萊頓（Philip Clayton），印度克理斯大學哲學學院院長卡查皮利（Kurian Kachappilly），新華社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薛穎，匈牙利布達佩斯長期可持續性研究中心主任阿提拉（Attila Grandpierre），中國泰威電子 & 斯美生活創始人李文良，美國著名可持續發展研究專家克裏福德·柯布（Clifford Cobb），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張俊峰教授，國際知名生態故事講述者蘇珊·施特勞（Susan Strauss），洛陽柯布生態文明院士工作站秘書長丁沙沙，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治河，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項目主任樊美筠博士等，共計百餘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生態文明專家、生態文明踐行者和青年環保志願者齊聚一堂，共襄盛舉。

“柯布共同福祉獎”是世界範圍生態哲學和生態文明

領域的最高獎項。該獎項以“我們時代的生態聖賢”、世界著名後現代哲學家、生態經濟學家，有西方綠色 GDP 之父之稱的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小約翰·柯布（John B.Cobb, Jr）博士命名，旨在獎勵世界範圍內為推動生態文明和增進人類與自然共同福祉做出杰出貢獻的生態環保人士。該獎項每年于“克萊蒙生態文明國際論壇”召開之際舉行頒獎儀式。

“柯布共同福祉獎”（簡稱“柯獎”）獲獎者必備如下五大特徵：1）批判意識——意識到世界出了問題，產生改變的願景；2）創造願景——能夠想象出將世界傷痛轉化為實際路徑的能力；3）採取行動——把願景變成現實的勇氣和行動力；4）堅守承諾——致力於改變社會、社區和自身的艱苦工作的承諾；5）獲得成果——在生態文明建設中做出傲人成就，獲得社會的贊譽。

儘管“共同福祉”概念長期以來遭到放逐，“共同福祉的微光在市場資本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與‘美國例外論’的探照燈下奄奄一息”，但在演講嘉賓盧巴斯基教授看來，“共同福祉是一場當今世界亟需的認知革命。它要求我們看見：每個生命都是宇宙的神經末梢，痛着別人的痛，笑着別人的笑，在嵌套的共同體中呼吸與共。這種關係性存在論，不僅是享受生命之美的前提，更是文明存續的基石。”她感謝各位來賓，視在座的每位嘉賓為“織網者”，“你們用經年累月的堅持證明：共同福祉不是烏托邦，而是正在生成的新文明基因”。

2025 年恰逢“我們時代的生態聖賢”、西方世界“綠色 GDP”之父小約翰·柯布院士 100 歲華誕，也是老人 2015 年罄家舉辦美國生態文明千人大會 10 周年紀念。第

17 屆“柯布共同福祉獎”頒獎典禮是首次柯布院士去世後舉辦的頒獎典禮。柯布院士地下有知，一定備感欣慰，因為他畢生為之努力奮鬥的生態文明建設事業後繼有人。

為緬懷柯布院士，頒獎開始前，播放了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制作的視頻《柯布與中國的建設生態文明》。柯布院士視中國為自己的“生態文明母邦”，他生前一再強調：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場偉大的歷險，並為自己能夠親身經歷和參與這場偉大的歷險而“感到非常榮幸”。柯布院士與中國的故事不僅是全球生態文明運動中的一個傳奇，更是中美民間外交的一個閃亮典範。視頻的背景音樂是葉倩文、林子祥的《選擇》，寓意着柯布選擇了中國，中國選擇了柯布——這是一種雙向奔赴！

今年的“柯布共同福祉獎”得主是世界著名生態教育家大衛·奧爾博士。按照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院長陶哲森教授的介紹，作為國際公認的頂級生態思想家，奧爾博士是一位以智慧耕耘大地、用行動詮釋可持續未來的先驅。他出版了包括《大地在心》《危局倒計時》等在內的 8 部裏程碑式的著作，發表了 250 餘篇影響深遠的學術文章。

作為“生態素養”概念的提出者，奧爾博士深刻重塑了人類對生態素養、可持續發展及在地化教育的認知。他的理念跨越國界，在中國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被公認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兩三位環境教育學者之一”。作為學術殿堂的綠色變革者，在歐柏林學院擔任保羅·西爾斯杰出榮譽教授 30 年間，他培育了幾代改變世界的學子。如今，作為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實踐教授，他繼續播撒變革的種子。

奧爾博士不僅是思想家，更是踐行者。作為知行合一的生態建築師，他主持設計了被譽為“20 世紀最重要綠色建築”的亞當·約瑟夫·劉易斯環境研究中心，打造了可持續設計典範——彼得·劉易斯門戶中心，在阿肯色州歐扎克山區創立革命性的“梅多克裏克項目”，開創可持續農林實踐先河。作為“大地詩人”，奧爾被譽為“教育生態學領域的溫德爾·貝裏”。

頒獎詞說：“奧爾教授率先提出了‘生態素養’概念，

畢生致力於探索並深刻改變了我們在在地化學習、社群福祉和地球健康領域的思考方式、建設模式與教育實踐。憑借其變革性的遠見，他持續激勵着一代代人為實現更公正、更具韌性、更可持續的共同未來而奮鬥。”

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院長陶喆森和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秘書長曾慶華給奧爾教授頒發了獎狀，將頒獎典禮推向了高潮！

在獲獎感言中，奧爾教授說：“榮獲‘柯布共同福祉獎’令我深感榮幸且惶恐，在此向王治河、樊美筠以及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全體同仁致以誠摯謝忱——後現代研究院的工作所彰顯的遠見卓識與踐行力度尤令此獎項彌足珍貴。”奧爾教授強調，這個世界已然脫軌。就在此刻這一小時，我們將向本已熾熱的地球釋放相當於 18,000 顆廣島原子彈的熱能。建設生態文明是一場崇高事業，它因此也需要與之相匹配的勇氣。當我們對忠誠與摯愛的事物發出召喚時，勇氣便會從靈魂深處涌現——那是我們甘願為之赴湯蹈火的事業。為真正重要的事物而堅守是生命的意義之所在。我們需要永遠謹記：我們與一切生命血脈相連！真正的教育，應當教會我們守護生命之網的完整，應當指向萬物眾生的共同福祉。

來自全球十幾個國家的上百位中外生態人共同見證了奧爾教授獲獎的喜悅。在國際局勢動蕩不安、氣候異常加劇、“全球沸騰”的當下，中美聯手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比任何時候都顯得重要。正如盧巴斯教授在演講中所言，踐行共同福祉，本質上是一場充滿歡愉的生命慶典。洛陽柯布生態文明院士工作站也將秉承着關注生態文明在中國的發展方向這一願景，探索生態文明的教育價值及實踐傳播路徑，努力為世界提供一個可實現的“中國方案”。

今夜我們相聚，不僅為致敬先驅，更是在彼此眼瞳中確認：當無數個“我”融成“我們”，生命最本真的鮮活度便在此刻綻放。

（作者丁沙沙，洛陽柯布生態文明院士工作站秘書長）

共同福祉與生命的鮮活感

【美】珊卓·盧巴斯基

戴維·奧爾（David Orr）曾提出一個多數學者從未思考的元問題：“教育是爲了什麼？”他明確指出，教育的主要目的不是爲就業培訓、個人晉升或國家建設。他告訴我們，可持續發展不僅是技術上的挑戰——我們還必須關注倫理、治理與社區。“教育的價值，”戴維說，“必須以體面與人類生存的標準來衡量。”教育應致力於可持續發展，幫助我們學習如何以支持整個生命體的方式生活。教育，應該是爲了共同福祉。

儘管一些同胞認爲大學是激進機構，但實際上大學是一種極其保守的存在。戴維呼吁在民主實踐的大框架下探討可持續性，打破了三條“神聖規則”：學科邊界之規、價值中立之規以及文憑經濟價值最大化之規。而“爲了共同福祉而教育”從來不是高等教育的組織原則。

儘管如此，戴維，你堅持了下來。你喚醒了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意義，使其轉向共同福祉的目標。我就是深受你影響的人之一，我懷着深深的感激之情，爲今晚能够一同慶祝你的洞見與智慧、你對我們生命的影響而感到高興。

美筠今晚請我談談“共同福祉在當今世界的重要性”。在我們國家，許多人將“共同福祉”與“多元、公平、包容”（DEI）混爲一談——用特朗普在 1 月 20 日總統行政命令中的話來說，是“歧視性的、浪費的、不道德的”。共同福祉成了“人民的敵人”。

在我居住的亞利桑那州，學券制度嚴重削弱了公立學校的資金。全國各地，公共圖書館正遭遇各種攻擊。從美國郵政到氣象服務、乃至海底資源，一切公共服務都面臨被私有化的威脅。“我該給孩子打疫苗嗎？”這個問題，在美國相當一部分家長眼中成了爭議焦點——

仿佛孩子生活在真空中，病毒不過是覺醒派想出來的玩意。

公正地說，即使在最新一輪對公共領域的攻擊之前，“共同福祉”這個概念早已在市場資本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全球化和美國例外論的鼓噪下變得空洞。就連我們的兩大主流政黨，在談到“共同福祉”時，也大多是在私營企業與 GDP 增長的敘事框架內操作，始終帶着不安。否則我們怎麼解釋：爲什麼我們沒有全民醫保？爲什麼我們應對氣候變化不力？爲什麼學生債務高企、無家可歸者增加、飲用水裏還有“永久化學物”？

即便是那些相信共同福祉、并致力于建立公正、富有同情心且可持續社區的人，也往往陷入市場經濟的思維方式。我和丈夫馬克與一群主要由年輕人組成的群體合作，他們熱情投身于農業。他們參與非營利工作，支持本地農民，爲糧食短缺人群提供食物，創建學校和社區花園。我愛他們所有人。但儘管他們某種程度上致力于共同福祉，他們的思維仍局限于現行的社會結構。他們中有人與本地糧食中心合作向饑餓者分發食物，却對“最終目標是讓這個非營利組織不再存在”這個想法感到反感。支持本地農民的則專注于土地與設備的獲取以及市場擴展，從未思考過糧食生產私有化的問題，也未曾探索建立一個公共補充系統的可能性。

坦白說，在接觸到糧食經濟學家約翰·艾克德（John Ikerd）的工作之前，我從未想過糧食應該像水和廢物管理一樣，成爲城市基礎設施的一部分——作爲一種公共事業。打破主流思維方式是非常困難的，即使對我們這些自認爲在努力打破它的人來說也是如此。

然而，我認爲我們所有人，無論是否追隨市場資

本主義，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自由地享受生命鮮活感的簡單渴望”。這是懷特海對“成為的目標”的簡寫。我們追求那種存在的鮮活與強度，並通過與生命的關係來塑造自己。

但我們在如何實現這種鮮活生命體驗方面却差異巨大。正如懷特海所說：“我們關注的思想類型，以及我們推到背景中去的思想類型，決定了我們的希望、恐懼與行為控制方式。我們如何思考，就如何生活。”

共同福祉依賴一種深度關係性的思維。它邀請我們走入一種對現實的理解，而在座的每一位都投身其中：我們彼此內在相連，能感受他人的情感，被這些情感塑造，並嵌套在一個個社區之中。這就是“共同福祉的形上學”，是我們能夠享受生命鮮活感——更別提生存下去——的根本基礎。

儘管自從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1968 年發表《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以來，這一敘事受到廣泛修正，但許多人依舊持有另一種現實圖景：人類本性貪婪、自私、害怕錯過他人擁有的資源，而非強調深度關係與合作。但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對這一悲劇敘事提出了根本性挑戰。她的研究表明，所謂“公地悲劇”實質是社區瓦解的悲劇，而非人類自私的必然結果。是的，我們可能會自私、恐懼、貪婪。但她發現，“緊密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規範”可以抑制這些衝動，使人們能夠在社會與生態的限制中實現合作共存。

豐富的社會網絡也是抵抗的土壤。關於猶太人大屠殺期間的“營救行為”文獻指出兩個原則：第一，儘管沒有明確的人口統計特徵可以描述那些營救者，但研究者克裏斯滕·倫威克·門羅（Kristen Renwick Monroe）發現，他們有一個共通點——認為自己“通過共同的人性與全體人類相連”，並堅定地相信每個個體生命的珍貴。“我們就像是一個共同體中的細胞，”一位被採訪的營救者說，“我周圍的細胞發生什麼，也會影響我。”第二，證據顯示，社會網絡在營救行為中起關鍵作用。大多數幸存的猶太人，比如法國勒尚邦（Le Chambon）村

莊系統下得以保護的五千人，都是依靠現有的支持網絡而得救的。

我們怎麼思考，真的很重要。我們如何組織自己，也同樣重要。

每一個珍貴的生命，都需要共同福祉才能繁榮。問題是，很多人生活在“被削弱的社區”中。在我們最需要強大社區的當下，很多人却不了解鄰居、不認識自己的民選代表，不知道市議會在議什麼議題。多數人從未寫過讀者來信、也從未在議會會議上發言。我們成了非常私人的“私人公民”。

但在如今這類特殊時期，共同福祉就像在生病時才被珍視的健康一樣，突然被照亮。過程－關係哲學者給了我們一個願景與結構，而現在我們要做的是組織行動。有眼前的任務，比如挺身抗議對民主的攻擊——提高音量，提高溫度，提高我們對共同福祉受到攻擊的可見反抗，比如特朗普政府最近試圖破壞中美關係、攻擊中國學生與學者的行為。

也有長期的任務，比如建立能改變文化、鞏固共同福祉的結構，使之成為文化中理所當然的一部分。今晚在場的許多人都在從事這項工作。美筠和治河數十年來致力於將“生態文明”的理念變為現實。戴維·奧爾為我們提供了大學校園乃至整座城市模式。還有肯尼亞的扶貧項目，我今晚非常高興能聽到相關消息。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的實踐，它們能讓我們共同福祉的願景成為真正的存在。

實踐共同福祉，在倫理、社會與政治層面是變革性的；在體驗上，它也充滿喜悅與生命力。所以我們今晚聚在一起，慶祝共同福祉，致敬那些致力於締造它的人們，並一同參與到享受生命鮮活感的實踐中。這正是讓共同福祉鮮活呈現的最佳方式之一。

感謝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和樊美筠給我這個機會參與這場慶典。也感謝在座所有人，感謝你們在創造與維系共同福祉的路上所做的、以及仍在繼續做的努力。

【作者珊卓·盧巴斯（Sandra Lubarsky），美國著名過程美學家、美國旗杆大學校長】

祛魅與重構：建設性後現代視閥下的《我的阿勒泰》

佟金丹

李娟的原創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以及由滕叢叢導演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以清新的筆觸和細膩的視角，為我們構建了一個迥異於現代文明規訓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田園圖景。這部作品不僅是對新疆阿勒泰地區游牧生活的忠實記錄，更是一場以生態整體主義消解人類中心主義、用多元共生倫理對抗現代性分裂的深刻實踐，其精神內核與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祛魅”與“重構”的思想邏輯高度契合，并形成深刻共鳴和精妙互文。

一、祛魅現代性規訓，重建具身性倫理關係

作品中反復呈現的游牧生活場景，本質上是對現代性時間暴政的祛魅。當城市生活被切割為精確的鐘表時刻，阿勒泰的牧民却遵循着“草場復蘇——牲畜轉場——雪被覆蓋”的自然節律。這種對自然時序的敬畏，恰是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批判的“人類中心主義世界觀”的鏡像反轉。

現代性空間生產中的“附近消失”癥候，在作品中被重構為充滿溫度的生存倫理。張鳳俠經營的小賣部不僅是商品交換場所，更成為哈薩克牧民傳遞口信、調解糾紛的公共空間。當李文秀為討債踏遍氈房，她逐漸理解賒賬簿上那些“用一匹馬抵債”的信用邏輯，實質是對金融資本異化人際關係的詩意反抗。這種“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形態，在建設性後現代主義視野中，恰是重建具身性倫理關係的可能路徑。

二、超越人類中心主義，重構生態整體性

李娟對阿勒泰自然景觀的書寫，始終遵循着生態整體主義的美學原則。她筆下的雨不是氣象學概念，而是“能淋濕牧羊人氈帽的調皮精靈”；風沙也不是需要徵服的自然災害，而是“塑造游牧民族粗獷面龐的雕刻師”。這種擬人化書寫消解了主客二分的現代性機械思維，使自然重新獲得主體性地位。

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係，是這部作品最核心的主

題之一。人（牧民）不是自然的主宰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深刻依賴并受制於自然（嚴寒、風雪、乾旱）。牧民與牲畜、草原、山川、河流緊密相連，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李娟生動描繪了這種相互依存、共榮共損的關係。自然在李娟筆下充滿靈性和力量，不是被動的客體。暴風雪、河流、動物（如牛、羊、駱駝、狗）都擁有強烈的“主體性”和影響力，深刻地塑造着人類的生活和命運。這種生態整體主義的包容思想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狹隘和短視，為實踐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和諧生活範式、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模式提供了思想基礎。

《我的阿勒泰》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幕，是李文秀在夏牧場親眼目睹巴太為救自己，噙着汨射殺心愛的坐騎“踏雪”，這場悲劇本質上是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詰問——在生態整體性視野中，任何物種的生命價值都不應淪為工具理性的犧牲品。

作品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智慧，暗含着對現代性空間固化思維的超越。蘇力坦老人拒絕交出獵槍時那句“我喜歡的生活一樣樣消失了”，道出了傳統生態知識體系瀕臨崩解的哀歌。而李文秀最終選擇留在阿勒泰，象徵着年輕一代在全球化浪潮中追尋并重構民族文化根性的可能。這種“在遷徙中堅守”的生存策略，與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倡導的“流動的現代性”形成共振。

三、解構線性進步觀，在時間褶皺中尋找救贖

作品通過時間與空間的雙重敘事綫索，完成了對現代性線性時間暴政的深刻批判。李娟以“記憶之中”與“角落之中”兩輯散文，將線性時間折疊為共時的存在空間：正在轉場的羊群與記憶中母親翻曬的奶疙瘩共享同一維度，這種時空錯置的書寫策略，解構了啟蒙運動以來的進步史觀。當電視劇採用倒敘手法，以老年李文秀翻閱舊作開場，更強化了這種“時間褶皺”的視覺隱

喻——在阿勒泰，過去與未來不是斷裂的綫段，而是交織的經緯。

對現代性异化的批判，在托肯追求婚姻自主的敘事綫中達到高潮。這位哈薩克婦女衝破“兄終弟娶”傳統桎梏的掙扎，不是簡單的性別平權敘事，而是對現代性個體化困境的超越。當她最終帶着孩子離開公婆家，這個充滿現代性色彩的結局，却發生在沒有婚姻登記制度的游牧社會，這種時空錯位恰恰揭示了所謂“進步”的相對性。

四、超越現代性异化，重構地方性知識

在《我的阿勒泰》中，哈薩克諺語“歌和馬是哈薩克人的翅膀”的反復出現，構建了獨特的游牧文化認知體系。這種地方性知識不是博物館裏的活化石，而是仍在塑造現實的力量：巴太通過辨別馬蹄印尋找走失馬群的能力，李文秀從牧民口述史中獲取創作靈感的經歷，都證明着多元文化共生的現實可能性。當電視劇以現代化的光影聲電技術呈現出哈薩克族歷史悠久的“阿肯彈唱會”時，這種口頭傳統與現代視聽媒介的結合，恰是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多元文化并置”理念的影像化實踐。

對現代性規訓的批判，最終落腳于對“無用之用”的哲學升華。張鳳俠在樹下對李文秀說出那段“有用”

與“無用”的智慧金句，正是《我的阿勒泰》想表達的重要核心思想：“啥叫有用，李文秀？生你下來是爲了讓你服務別人的？你看看這個草原上的樹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沒有人用，他就這麼呆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這種達觀超脫的智慧與莊子“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的思想形成跨時空的唱和與對話。這種思想對現代性工具理性的批判和超越，在李文秀放棄城市作家夢、選擇記錄牧民日常生活場景的抉擇中達到高潮——當她用哈薩克語記錄接羔經驗時，文字不再是資本市場的兌換券，而是生命經驗的自然流淌。

《我的阿勒泰》以其獨特的詩性智慧和清新視角，爲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提供了鮮活的文藝注腳。它告訴我們：在全球化與地方性、傳統與現代、人類與自然的永恒張力中，救贖不在于回到前現代的烏托邦，而在于培養“既在內部又在外部”的雙重視野。當李文秀最終在阿勒泰湛藍的天空下找到寫作的母題，她完成的不僅是個體的精神成長，更是對整個現代性方案的溫柔修正——在祛魅與重構之間，一種更包容、更生態、更具韌性、可持續性的文明形態正在萌芽。

（作者佟金丹，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用責任感雕刻出企業的靈魂

——目擊“超凡之足”的可持續發展之旅

朱麗君 宋昕霖

在美國華盛頓州西北角，太平洋的濕潤氣息沿着努克薩克河 (Nooksack River) 緩緩上升，喀斯喀特山脉 (The Cascade Mountain Range) 的雪峰靜靜守望着林地與溪流。這裏是芬代爾 (Ferndale)，一座低調而寧靜的小鎮。在小鎮的一隅，1820 Scout Place，以倡導和踐行可持續發展著稱的“超凡之足”公司 (Superfeet Worldwide LLC) 安靜地伫立着。

六月的傍晚，夕陽在雲杉與鬆林的縫隙間灑落餘暉，空氣中仍帶着河流與森林混合的清新氣息。下午五點，原本已結束一天工作的“超凡之足”負責可持續發展項目的負責人以及人事主管特意留在那裏，迎候遠道而來的中國生態文明代表團。沒有喧囂，祇有一種安靜的尊重和溫暖的相迎——正如這家企業一貫的氣質：低調、穩重、真誠。

這是一家制造鞋墊的工廠，又遠不止是一家制造鞋墊的工廠。

四十七年前，兩位創始人丹尼斯·布朗與克裏斯·史密斯博士，在一間簡陋的足部健康工作室裏，開啓了他們對人體生物力學的探索。那時，他們以手掌托起無數雙疲憊的足弓，在一雙雙量身定制的鞋墊中，寄托着對人類健康行走的守護。而今天，“超凡之足”的產品已遠涉五十多個國家與地區，陪伴着登山者、跑步者、旅行者，走過山川、平原與海岸。

然而，這家工廠真正的故事，不在市場份額的曲線上，而深藏在那些靜默而堅定的選擇與堅持裏。

“超凡之足”選擇在時間的長河中聆聽地球的心跳。它在每一片材料的選擇中，刻下對自然的敬畏與承諾——如今，80% 的鞋墊面料源自回收再生織物，中層泡棉正逐步替換為可再生材料，而支撐結構將在 2025 年全面轉向可回收塑料。連包裝也褪去繁復，祇留下輕盈的環保紙盒與一雙靜靜安放的鞋墊，仿佛連產品本身也在練習節制與克己。

在生產綫的背後，一場關於能源與碳排的修行正悄然展開。自 2022 年起，“超凡之足”已實現 100% 可再生能源供電，LED 燈光點亮着深夜的車間。更令人敬佩的，是那份如雕刻般精準的碳足跡測量報告——材料、物流、零售、廢棄、組裝，每一環節都被清晰拆解、量化，仿佛在這座現代工廠的心臟深處，跳動着一部有序而溫柔的生態時鐘。

而這家工廠最柔軟的部分，并不在機器轟鳴的節奏裏，而在人心深處的信任與托付之中。

“超凡之足”曾大膽嘗試讓每一位員工成為公司股東，共享成長的果實與未來的榮光。每天清晨六點，工廠準時蘇醒，下午三點半安然收工，讓員工在最好的陽光中歸家，享受生活與家庭的溫暖時光。除了體面的薪資，公司更為員工提供了完善的保險與福利，久而久之，“工廠從不缺人，反而排隊等崗”成了芬代爾小城裏廣為流傳的故事。

公益在這裏也并非遙遠口號，而是流動在日常制度中的真實承諾。公司每年拿出 1% 營收支持非營利組織，同時賦予每位員工 1000 美元的個人公益額度，讓

善意與責任在每個員工的手中流動、生長。而那支名為“星球隊”（Planet Team）的內部志願者團隊，更讓普通員工也能參與企業的綠色決策，在生態轉型的每一步中貢獻智慧與熱情。

站在這片被林地、雪山與河流環繞的生產車間裏，中國生態文明研究專家和踐行者心生敬意。

山西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張俊峰感嘆道：“小企業也能走出一條專注、深刻、自主的技術與文化之路。”

生態美學研究者、山東社科院研究員李玲低聲道：“一雙鞋墊，竟承載着對人類健康與地球命運的雙重守護。”

溫州大學同一健康研究專家張媛媛則說：“‘超凡之足’像過程哲學的踐行者，既不畏繁復，也不棄柔軟，用責任感雕刻出企業的靈魂。”

中國生態企業家、深圳泰威公司董事長李文良動情表示：“他們用定制化減少浪費，用本地化回應責任消費，用制度化公益踐行社會溫度——這是一個真正有愛心、有擔當的企業公民。”

短短半日的參訪，却像穿行在時光隧道中，讓人看見工業制造的另一種可能：

可持續，并非犧牲盈利的代價；

人文關懷，并非企業的附屬品；

而是創新與競爭力的源泉，是企業血液中最柔軟却也最具力量的部分。

“超凡之足”，像一面安靜的鏡子，映照着制造業面向未來的遠方——

去重新審視原材料，給地球更多喘息空間；

去革新能源系統，讓每一度電光都流淌着善意；

去重構供應鏈，讓浪費消弭于源頭；

去信任員工，讓尊嚴與幸福成為最持久的生產力。

在這片森林、雪山與海風相伴的土地上，在那一雙雙默默承托人類行走的鞋墊中，“超凡之足”已悄然種下綠色的種子——等待着，在全球制造業的每一寸土地上，次第開花。

（作者朱麗君，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宋昕霖，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青年項目主任）

身心板結與語言治療

——《野性的思維》中隱藏的現代人解決方案

逢 飛

我們到山裏，不是做野人（如今很多城裏人到山裏來帶着一種放任的態度，所謂鄉村回流相當一部分是因為短期內城市失意者的大量激增），而是一種“迂回的回應”，回應主流文明的困境。我們不僅全情關注社會的病與痛，而且主要是認真做“在一身的實踐”——在一個看似荒僻鄉野的地方實踐“萬物備于我”的自本自根、原始原生的生命機能，以期充盈“人初本善”的人性認知，重建“道義體知”的社群信心。

在這個“自然—生態—人文”三重交疊的精神洗禮之下，一個現代的中國人，可能做到或如何做到“既是野性的又是文明的”？

大部分國人都知道青年毛澤東《體育之研究》中“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這句話，然而實際上又都兩分地想着：文明是一樣、野蠻是一樣，匆匆忙忙地斷章取義……

我特別贊同法國文化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野性的思維》中的一些觀點和看法。（真沒想到，在我求學哲學道路的初始階段，即本科階段，看似偶然相遇屈指可數的那麼幾個人、那麼幾本書，居然都在我後來的思考與實踐道路中一再邂逅、適時相逢）。

優秀的文學勝于庸俗的思考，它祇需描述而不假借定義，列維－斯特勞斯在《也行的思維》一書開篇引用巴爾扎克一段話：“世界上祇有野蠻人、農夫和外鄉人才會徹底地把自己的事情考慮周詳；而且，當他們的思維接觸到事實領域時，你們就看到了完整的事物。”

毫無疑問，今天的人類知識過于理論化，這沒什麼好或不好（因為已經是這樣了），但往往由此而引發自命不凡并繼而更嚴重地丟失了另外的越來越不可能知的知識的可能性，即“具體性知識”——它涉及原始認同的感情、神聖秩序的精準的校驗、求知欲的平

衡，等等。這是一種“不夾私念的、專心一意而又情深意長的知識”（46頁）。

中譯者李幼蒸先生在序言中說：《野性的思維》一書主要研究未開化人類的“具體性”與“整體性”思維的特點，並力申未開化人的具體性思維與開化人的抽象性思維不是分屬“原始”與“現代”或“初級”與“高級”這兩種等級不同的思維方式，而是

人類歷史上始終存在的兩種互相平行發展、各司不同文化職能、互相補充互相滲透的思維方式。他斷言人類藝術活動與科學活動即分別與這兩種思維方式相符；正如植物有“野生”和“園植”兩大類一樣，思維方式也可分為“野性的”（或“野生的”）和“文明的”兩大類。

更早些的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中說，“可以把原始人的思維叫做原邏輯的思維，這與叫它神秘的思維有同等權利”，他提出支配原始思維的“互滲律”——“在原始人的思維的集體表象中，客體、存在物、現象能夠以我們不可思議的方式同時是它們自身，又是其他什麼東西。它們也以差不多同樣不可思議的方式發出和接收那些在它們之外被感覺的、繼續



在椶櫚樹梁上，新麥粒與芒

留在它們裏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質、作用”（商務《原始思維》1986 丁由譯）

其實，現今社會文明程度，頂多算在“半開化”一格，既日漸失去其原質的原始思維或野性的思維，也遠未達到真正如所宣稱的文明的開化的程度。放在世界運轉的現實秩序的角度，在 2020 之後想必很多普通人更加感同身受、心知肚明。關於人的、人性的危機再次以觸目驚心的方式呈現出來：身心板結的主要癥狀是人們幾乎很難真正地思考什麼或者去想象、去感知一件完整的事情，更不要說去做點什麼足以令人陶醉其中的賞心樂事。要想頭尾始終、有本有末，人或整個社會意識狀態的精神頭已經不能夠了，一切都顯得鷄零狗碎、揚花飛絮。在繼續前行與退守之間，人們正在失去重心，整個生活世界感覺那麼地不真實，

沒有質感，在游走和遊戲的過程中，人自身成爲一個“不能自持、沒有質地的游移的生命狀態”。

科技理性高度發達如人工智能似乎帶來一波波“重啓人類社會”的火星盼望，然而更多的地面的市井日常則是耽延在各種各樣的不斷解釋、不斷重新下定義然後再解釋的渦流中的掙扎。語言空前僵化，已是一動不如一靜、語不如默，一言爲多，開口即錯，講話者都成罪人。

人的意識本有自我轉化的功能，這種轉化作爲精神上的一種修行、修養或者自我訓練，是借由語言、前語言（約等於邏輯、前邏輯的）的復蘇、甦醒而同時伴生的身心狀況與道德感的一體轉化……

（作者逢飛，柯布生態書院北京椒樹梁分院院長）

後記

下雨前兩天，與徐偉在椒樹梁勞動：開溝，撒肥，點籽，覆土，鋤草。徐偉是原北師大社團農民之子最早發起人之一。兩天勞動中，我分享了一點體悟和觀察：當動作從生疏的模仿、手脚身形的不協調到全身開動、熟練自如的時候，心意不再外顧外放而是斂靜收息。這個身心一致的時候，人的氣性、氣血同調，人的精神世界的自我教化／教養就開始做工夫了。

這個時候，人的意識中最細微、最明顯的變化是什麼呢？你的語言的能力，語言感知和語言運用的能力開始變化提升了，你對一個動作的感知更豐

富更真實了，你突然覺得一個單一的肢體動作，就祇那麼一下子，可是它可以對應許多的語詞，用許多平時想不來、用不到的語詞來描摹、接近一個動作或者一個心理事實，許多詞一時汨汨不盡地涌現進來，爭相地擠進來，甚至形成一個新的、相近相關聯的語族的匯聚和呈現。你自己能感覺到就好像有了新的語感、一套新語言正在重造、奠基，甚至，你會發現，往日的沉睡的名詞蘇醒了，地上的石頭也開始流淌起來，每一個詞都在“返溯”到它的原始的動詞性，語言的開化慢慢地拱動了你早已僵化板結的身心，還是在這個一瞬間，你的道德意識、人性的莊嚴開始自發的一點點萌生……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

樊美筠

編委：

王治河

朱易

謝文鬱

黃勇

馮毅

曾慶華

倪培民

王蓉蓉

顧問：

葉朗

周桂鈿

安樂哲

樂黛雲

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爲序）

丁子江

王寅

劉孝廷

劉全華

李晨陽

陳俊偉

林克勤

楊富斌

歐陽康

張修玉

顧林玉

鞠實兒

溫恒福

魯樞元

俞懿嫻

金惠敏

陳榮灼

吳國盛

李惠斌

曲躍厚

劉笑敢

成長春

丁宏偉

責任編輯：

許迎輝

地址：PO BOX 212 Claremont, CA 91711 網站：www.postmodernchina.org